

博雅史学论丛 / 中国史

# 改良与革命

晚清民初  
史事新探



王晓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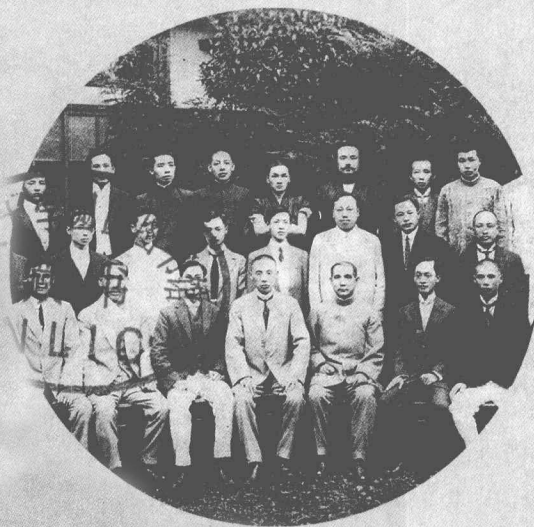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史学论丛 中国史

# 改良与革命

晚清民初  
史事新探

王晓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王晓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博雅史学论丛·中国史)

ISBN 978-7-301-21246-2

I. ①改…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736 号

**书 名:**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

**著作责任者:**王晓秋 著

**责任编辑:**刘 方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246-2/K·089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25 印张 288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自序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稀”，可是如今活到七八十岁早已不稀奇了。我甚至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七十岁可能正处于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因为他这时候可能具备了更高的史学修养，更多的史料积累，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更深邃的理性思维。

本人今年正好年届七旬。自报家门：1959年毕业于百年老校上海徐汇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曾得到史学大家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等恩师的教诲。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和民国初年历史）和中日关系史（尤其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和研究。本书即是自己治史五十年来对晚清民初历史研究之部分心得成果的汇集。

我历来认为“学术贵在创新”。史学也是一样，史学论著的学术价值应该是在继承前人治学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样才能推动学术不断发展。当然，真正的学术创新决不是随意或轻易的“标新立异”，而必须付出艰巨的劳动，通过收集分析大量史料（而且尽量运用第一手原始资料），绞尽脑汁的思考与分析，以及勤奋刻苦的钻研与写作，才能达到。回顾五十年治史历程，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本书力图在晚清民初的历史研究中，或发现新史料，或提出新观点，或探索新理论，力求做到

## 2 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

言必有据,史论结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故本书命名为“新探”。

本书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改良与革命,乃是贯穿整个晚清民初历史的重大问题。本书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和剖析了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极其复杂的辩证关系,并首次较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晚清改革史的研究论纲和对辛亥革命世界意义的论述。此外对康有为的“仿洋改制”、清末京城立宪派和民国元年孙袁北京会谈、五四运动在东京等具体史事,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一些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第二辑中国与世界。晚清民初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形势的变化及中外关系的互动息息相关,我们必须用世界眼光来研究这段历史。晚清中国人究竟怎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视角。本书从此角度切入,较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改革先驱者的世界认识和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对几乎已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史实,加以重新挖掘,作了开拓性的实证研究。此外,还对晚清中国官员的三次集体出洋和晚清民初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以及晚清民初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

第三辑文献与传播。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史料的发掘、考证、研究是史学的基本功。本书对清末民初几部重要史料文献作了开拓性研究。如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花了两年时间钻研黄遵宪的名著《日本国志》,作了国内学界最早的基础性研究。而《日本变政考》这部康有为未刊的重要著作,则是笔者1980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先发现并作了研究,提出了康有为“仿洋改制说”和戊戌议会观的新见解,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汪荣宝的《宣统日记》初探和林之望的《庚申日记》初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晚清日记手稿所作的研究。前文提出了清末钦定宪法起草过程和清末京城立宪派等新观点,后文则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国耻实录。关于魏源《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是笔者在日本各图书馆收集到21种《海国图志》日文刊本后所作的文献传播研究。《革命评论》与中国同盟会也是笔者在日本查阅了日文《革命评论》各期全部原文后进行的实证研究。

第四辑北大校史丛考,是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和教师,对母校校史研究的一分贡献。其中包括通过查阅京师大学堂档案后为北大百周年纪念

所写的《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京师大学堂与日本》两文。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所写《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孙中山与北京大学》两文。还有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写的《五四时期北大师生与日本思想界的交流》，都是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以上四辑精选的 24 篇论文，可以算是笔者年届七十之际，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从事晚清民初历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供读者参考、批评，并能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有所启发。由于各篇论文写作于不同时间，发表于不同刊物，其中难免有些重复和编排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最后利用这个机会，向以往支持、帮助过笔者学术研究的各位国内外朋友们致谢！同时也向热情支持本书出版的北京市社科出版基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本书责任编辑刘方女士致谢！

王晓秋

2012 年 4 月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

遨游史海斋

# 目 录

自 序/1

## 辑一 改良与革命

试论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3

晚清改革史研究论纲/10

试论康有为的“仿洋改制”/23

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42

试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58

民国元年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谈新论/72

五四运动在东京新探/87

## 辑二 中国与世界

晚清中国改革先驱者的世界认识/93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103

1887年海外游历使新探/111

晚清中国官员三次集体出洋的比较/143

## 2 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

晚清民初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历史回顾和启示/154

晚清民初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159

### 辑三 文献与传播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177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初探/200

林之望《庚申日记》初探/216

魏源《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220

日本《革命评论》与中国同盟会/236

### 辑四 北大校史丛考

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的创立/245

京师大学堂与日本/263

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276

孙中山与北京大学/291

五四时期北大师生与日本思想界的交流/305



## 辑一 改良与革命



# 试论中国近代史上改良 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改良与革命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如何认识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它也是一个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着不同看法和分歧,而在青年学生思想中也常常容易产生疑问和困惑的问题。下面谈谈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着重晚清史)上改良与革命辩证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 一、对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认识的两种偏向

在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这个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比较极端的倾向。

一种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由于革命高潮时期遗留的价值取向和心态,以及“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等的影响,产生过一种“革命万能论”并一概否定改良的倾向。它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中具体表现为,一是把革命绝对化,认为革命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又是随时随地可以发动和成功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是夸大和拔高了农民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如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说成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等。而对太平天国革命中暴露出的农民阶级局限性、农民政权封建化等缺乏深入剖析。对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甚至对其落后、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消极一面也加以颂扬。二是贬低和否定近代史上的改良,把它与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凡是主张改良就是抵制革命、反对革命,以致把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改良运动一概加以否定。如称洋务运动是“反动卖国的运动”,把戊戌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而加以批判,清末新政则被全盘否定成“一场政治骗局”。

另一种倾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否定一切革命的“告别革命论”。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偏向,而且在学术界和学生思想中有一定的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教学以及某些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一是指责革命只是破坏而应予否定。如批评太平天国革命“破坏生产”、“杀人流血”,造成“历史倒退”。把义和团运动说成“蒙昧主义”和“邪教”,还指责辛亥革命破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军阀混战”。二是认为革命不如改良,革命派不如改良派。如认为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不如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认为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也是“有功的”,维护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和传统文化。又认为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黄兴不如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甚至不如西太后、袁世凯。还认为如果康有为的改良道路、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成功,那么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三是批评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冲动、冒险、情绪化的表现”。总之,他们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应该永远地“告别革命”。

这两种倾向都带有片面性,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辩证地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呢?这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进行深入具体的思考和分析。

## 二、关于革命、改良、改良主义的含义和区别

在讨论中国近代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革命、改良以及改良主义几个名词的由来及其概念、词义和语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汉语“革命”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早,《易经》中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sup>①</sup>成为儒家的一种政治话语。这里的“革命”的基本含义是变革天命,改朝换代,即肯定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用武力夺权建立新王朝,是顺应天意民心,合理合法的。但是后来的儒家学说更强调“三纲五常”,君臣伦理,就很少再用革命这个词了。

英语 revolution 一词,来源于古代拉丁文 revolvere,原指天体周而复始、循环变革的时空运动。后来逐渐转变为反政府的暴动、叛乱。经过 17 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和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又使其在政治领域产生新的含义,并出现和平渐进与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后来日本人又把这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汉字“革命”。由于日本人的“万世一系”天皇观,更强调尊王改革,有时把明治维新也称为“维新革命”。<sup>②</sup>

近代中国人用革命一词也受到西方和日本影响,1890 年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大多用“暴乱”、“叛党”,偶然也用了“革命”一词,如“群议废王,世称之为:三日革命”。<sup>③</sup> 1895 年,孙中山最早自称“革命党”。据说当年他发动广州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在神户登岸,看到日本报纸上刊登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消息,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sup>④</sup> 随着中国近代革命思潮和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革命”一词逐渐在中国流传风行。尤其是经过革命派的大力宣传鼓吹,如 1903 年邹容作《革命军》一书,大声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世界之公理也。”<sup>⑤</sup>同年,章太炎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称革命是“补泻兼备之良药”,<sup>⑥</sup>改良派梁启超 1904 年写《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进一步提出区分“革命”的广狭二义。他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

① 王弼注:《周易正义》卷五,中华书局,1957 年。

②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日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7—10 页。

③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菀园志民校刊本,1889 年。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 页。

⑤ 邹容:《革命军》,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51 页。

⑥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第 244 页。

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sup>①</sup>这已经比较接近我们现代对革命的理解了。

《现代汉语词典》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革命的解释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还有一种广义是指“根本变革,如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sup>②</sup>《辞海》上则把革命的广义解释为“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sup>③</sup>

改良与改革实际是同义语,在英语中常常是一个词 Reform,指改掉事物的缺点使之良好。改良与革命的区别,从哲学的角度说改良一般是量变和渐变,而革命则是质变和突变。从政治学的角度说,改良一般是在旧体制下局部渐进地改造;而革命则是要使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制度。也可以说改良主要是体制内的改革,而革命则是体制外的变革。

此外还要区别改良主义的含义和语境。所谓改良主义一般是指20世纪初列宁批判欧洲工人运动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用改良抵制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因此用它来称中国近代主张改良的思想和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戊戌维新运动,是不太合适的,应该给他们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

### 三、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我们再来进一步具体分析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各种辩证关系及其具体表现。

首先是革命推动了改良。中国近代历次人民革命,迫使统治者作出一些让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挽救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实行或多或少的改

---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

<sup>②</sup>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59—460页。

<sup>③</sup>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5728页。

良。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后,清朝统治者中较开明的人士,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实行办工厂、修铁路、建学校、选派留学生出洋学习等改良措施。而义和团运动之后,刚扼杀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陆续推行改革官制、训练新军、废除科举、鼓励发展工商业等改良措施。可以说在革命高潮之后或是新的革命形势、条件尚未成熟之时,改良会经常发生,并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一些改良措施,毕竟是一种社会进步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不应全部否定一笔抹杀。

革命还为进一步的改良扫除了障碍。腐朽、卖国的清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的严重障碍,因此辛亥革命通过武装起义用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政权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闸门。民国初年出现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改良潮流,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证明,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有可能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进行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sup>①</sup>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改良实际上也在为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革命并非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形势便没有革命”,而且也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还必须有革命力量的成熟。只有当社会改良的量变积累到相当程度,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革命的客观形势和发动革命的主观力量都已经成熟的时候,革命才会到来。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尤其是清末新政实行的一系列改良措施恰恰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物质、人才、思想等方面的条件。如洋务运动建立的军事工业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武器装备物质条件。清末新政编练的新军成为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清末的留日学生和各地新式学

---

<sup>①</sup>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4页。

堂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和骨干成分。还如武昌能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也是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在武汉设立汉阳兵工厂、训练新军、派遣留日学生、大兴新式学堂分不开的,所以有人说张之洞是“种豆得瓜”,与其主观愿望相反,培养了清王朝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改良的失败还促进了革命的爆发。例如戊戌维新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促使很多改良派转向革命,如章太炎、吴玉章等许多革命前辈,开始都赞成改良,后来发现改良道路走不通,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连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最初也曾经主张过改良,还想通过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建议。但结果却未得到李鸿章接见,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刺激,使他终于走上革命道路。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失败也促使许多原来还幻想在体制内改良的人们投向革命。清政府不但一再拖延立宪和开国会期限,而且镇压国会请愿运动,还成立“皇族内阁”,实行“铁路国有”等倒行逆施,终于使很多立宪派也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而转向同情、支持革命,或投靠野心家袁世凯。

还应该指出改良与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对立和斗争。改良和革命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在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革命就要爆发之时,如果仍坚持改良道路,而且用改良去抵制革命、反对革命,甚至勾结反动势力破坏革命,那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和绊脚石,这时就必须坚决加以揭露斗争,扫清阻碍革命的障碍。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就属于这种情形。当时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大肆攻击革命会造成流血、破坏,导致瓜分、亡国等等,甚至宣称“与革党死战是第一义,有彼无我,有我无彼”。保皇派把革命派当作首要敌人,并混淆革命与改良,欺骗舆论,蛊惑人心。因此革命派必须与其作坚决斗争,揭露批判其攻击革命的言论,指出如果不革命不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政府,人民才会更痛苦和流更多的血,国家才会被瓜分和亡国。只有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孙中山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两途,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如果我们读一读当年革命派在《民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保皇派并宣传革命的文章,就会感受到许多文章词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些言论也能回答和驳斥现在某些人鼓吹的“告别革命论”。还有人认为假设没有辛亥革命,让清政府按康有为、西太后、袁世凯的新政改良道路走下去,中



国可能早就现代化了。我们说一来历史不能假设,二来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正像孙中山说的清王朝已经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sup>①</sup>

总之,我们既不能用革命拒绝改良,更不能用改良否定革命。革命和改良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两种方式,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是一种极其复杂互动的辩证关系。研究历史要力求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和片面性。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具体事件、人物、思想,要放在当时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科学的结论。

---

<sup>①</sup>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54页。